

风暴前的一次环法旅行， 见证 18 世纪图书业众生相

于京东

1778年5月底，伏尔泰逝世。7月2日，卢梭病故。就在这两位启蒙运动最重要也最家喻户晓的先锋旗手辞世之际，盗版业与印刷商们嗅到了金钱的味道，洞悉时事变化、深谙市场行情的他们很快意识到，必须在读者痛失两位精神领袖的时刻“主动慰问”，抢先推出、销售他们的遗作和著作全集。于是乎，巴黎、里昂、日内瓦、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纳沙泰尔等境内外的出版社迅速行动，一面参与到抢夺手稿的竞争，一面派遣图书推销员展开环游法国的商业考察。

一场旧制度下外省城市的商务旅行

卢梭去世3天后，纳沙泰尔印刷公司便派出了推销员让-弗朗索瓦·法瓦热。这家公司成立于1769年，得益于普鲁士的庇护，在1776年《百科全书》的再版与重印中“撞大运”曾大赚一笔。但好景不长，1777年法国政府发布打击盗版与走私贸易的禁令，要求海关、总包税所和国内书商行会全力销毁各类盗印、偷运、走私的图书，再加上路易十六执政、内克尔改革和北美独立战争，出版社需要尽快分散城市，并深入考察沿途各城镇，马不停蹄地拜访客户、调查书商、打探消息、洽谈业务、回收款项，同时保持着及时的信件、日志与报告书写。正是这样一段旅程中的记述，被长期耕耘纳沙泰尔市档案馆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所意外发现，在近50000封信件与数以万计的资料中，他还还原了法瓦热的出差经历，连同这一时期出版社与各地书商的往来记录、订货清单与销售报表，从而呈现了一个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式的旅行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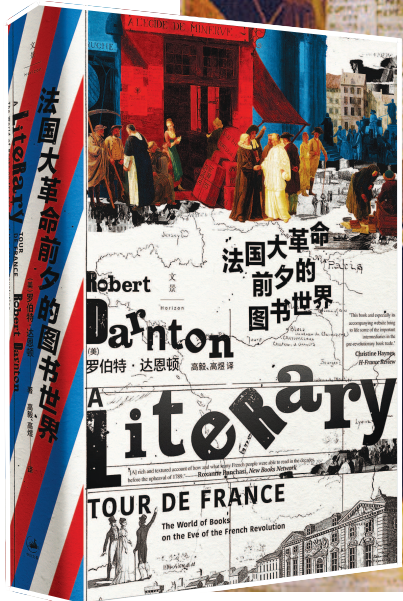
乍看之下，故事主人公是法瓦热——纳沙泰尔公司的旅行推销员。如同这一时期的货郎担、施工队、测绘师等众多巡法国的职业，它是在各类契机的促成下应运而生的：识字率的大幅提升，各地图书市场的兴起，皇家科学院的测量工程与地图出版，路桥建设大跃进后的旅行便利等等。不

过，在达恩顿看来，图书推销员这一行根源于十分独特的需求，即“在自由尚不可求年代，让读者可以拿到书”。为此，他们不仅需要顾及产业上游的创作、出版与印刷，还要及时了解下游的产品征订、分发、运输、销售与回款情况，其间种种越界、违法、交易与商战信息更需时刻关注。法瓦热可以说是最早一代的“产品经理”，他随身带着公司的最新目录及样品，推销、拓展市场，调查同行、书商、承运人与摊贩的业绩与“信用”(confiance)，同时活用新教徒组织、熟人网络和公司线人，搜集各类情报：都在卖些什么书，谁家印些什么书，读者订什么书。这也正是达恩顿史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即18世纪那些流行于法国的书籍是如何出现、生产、流传，又如何在那儿被阅读的？

来自地下图书世界的“人间喜剧”

为讲好这个故事，达恩顿沿用其一贯的口语化写作风格，以引人入胜的情节来铺陈叙事。从《启蒙运动的生意》到《屠猫记》，再到本书《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他都试图通过对出版商、盗印者、偷运人、小商贩等普通人物的讲述，“让他们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也是20世纪“新史学”运动的宗旨所在。与法国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对16-17世纪法国社会文化的研究一样，达恩顿不是依赖于档案和数据统计基础上的量化或系统研究(事实证明也不一定可靠)，而是选取大革命前夕图书世界的几个断面——确切地说是广大地区中18个城市的案例，这些个案研究逐一将畅销书的定例分析与信件、报告、日志的解读结合起来，并借由法瓦热这位“以在18世纪的社会条件感知图书需求并予以满足为业的专家”的一段旅行呈现出来。通过他1778年在法国各地的推销、拜访、谈判、交换货品及秘密调查等活动，我们看到旧制度最后的一二十年里一幅幅千姿百态、酸甜苦辣、挣扎求生于图书贸易行业的众生相，他们中有书店主、承运人、偷运者、流动商贩等，涉及人物众多，单是详细考察过身家背景、经营状况、订购书单与信件往来的就达25处之多。

这些书生于当地图书市场的一个个底层人物，是达恩顿故事的真正主角。作者跟随着纳沙泰尔的推销员，一路见证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
[美] 罗伯特·达恩顿著 高毅 高煜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公司出版

了全景式的行业生态与阅读生活，而且穿插着横向的地域比较与纵向的时段分析。达恩顿甚至不时将过往著作中的“主角”(比如《启蒙运动的生意》中的盗版商迪普兰、《警探整理他的档案》中的戴梅里)拉来“客串”一番，让我们看到图书世界里从哲人、写手、商贩到走卒之间的多样生活，更是强调了这些场景、人物之间彼此交织的历史关系网络，基于这种阅读史的网络我们也可以推及到更深层次的关于近代法国文化的诸多思考：旧制度下的政治结构与社会形态、启蒙运动中的下行及其思想传播过程、新型阅读方式(城市的沙龙、俱乐部、咖啡馆、外省及农村书商的读书会、借阅室、故事会)与公共舆论的成形等等。

尽管法国当代著名史学家罗杰·夏蒂埃不赞同“书籍的力量必然导向启蒙或革命的某种目标设定”，但不能否认的是，阅读发展出了一种对旧制度及其生活的批判态度。达恩顿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推进了20世纪以来的心态史研究，提出“观念的社会史”路径——即在启蒙运动中的法国，观念是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态度和价值观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书籍产业的上游与下游之间，普通人又是如何努力生活的？

从本书所统计的结果看，1778年

法瓦热拜访的商户中仅有几家得以维持经营到革命之后，大部分在1783年前后就已销声匿迹，他们同出版社的书信往来也戛然而止。这其中自然不乏个体因素，比如卢丹的乌勒布、布卢瓦的莱尔，这些失败者的共性是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指望一夜暴富，过度下单，以致无法有效维持收支平衡。也有的是因为残酷的同行竞争，虽然印刷商、书店之间有时会交换货品，增加多方盈利的可能，但更多时候充斥着谎言、奸计、举报与恶意倾轧。不过，这些不足以解释：为何大部分的外省图书产业在1780年代以后都走向了衰败？

其实，达恩顿在书名中已埋下线索。随着阅读的深入，通过纳沙泰尔推销员的眼睛，读者慢慢看到了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首先，1777年和1783年的法国政府禁令对各地图书产业是毁灭性的，借用马塞大书商莫西的话就是：“十年后所有的零售书商毫无疑问都会破产。”其次，北美独立、英法交恶，不仅造成贸易与经济形式的恶化，还带来更直接的两种负面效应：一是相较于买书，人们的钱更急于应对1775年后的其他危机——如歉收和失业上贪多求快、粗枝大叶。最后，18世纪末，图书出版所承载的时代使命似已

到了力竭阶段。为何？达恩顿在书中没有明说，但不难推测：新的信息媒介与阅读形式(报纸、杂志、小册子)如同火山喷涌，其灵活、低成本、时效性与大信息量有效满足了阅读需要。人们不再喜欢图书，而是被更新奇、快捷的出版形式慢慢征服了，后者也更适应当年暗流涌动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舆论。与之相应，一度享受了启蒙运动红利的国内外盗印与出版也走向了末路。大革命来了，从边境到法国各地的地下图书世界反而消失了。在1778年旅行的五年后，法瓦热同图书产业告别，与兄弟经营食品杂货生意去了。他的老家纳沙泰尔出版公司此时正濒临破产。

理解异域文化的“入门手册”

对于读者而言，理解18世纪法国的图书世界无疑是一场异国他乡的“旅行”，就像1778年独自上路的图书推销员一样。对于法瓦热而言，好在有《出版年鉴》(1777)、《卡西尼地图》(1750-1815)、《法国实录》(1715)这些指南，可助他在陌生城市走家串巷、捕捉传言。对今天的读者而言，好在也有达恩顿的这本书，为我们理解近代法国的外省社会与阅读文化提供了

【书人茶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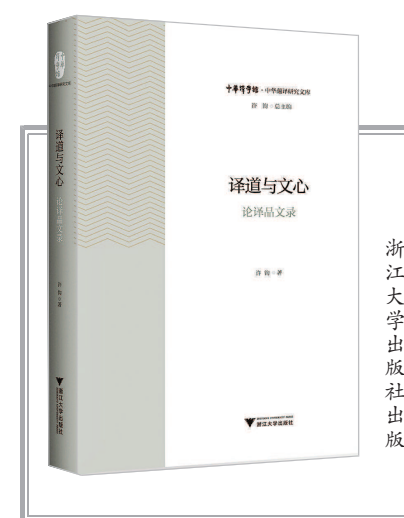
有思考才会有质疑，有探索才会有发现

——从《译道与文心》谈翻译问题

许钧

大学毕业至今已有45年，多年来渐渐地养成了习惯，喜欢每天读一点书，思考一点问题，写一点文字或译一点东西。前些日子，与浙江大学外语学院的年轻学者探讨学术问题，我谈了自己关于学术研究与自身成长的一些看法：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的场所。一个学者，应该一直处于读书、思考和写作的自觉状态，这是一种常态。前段时间，我把这些文字集结出版，献给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译道与文心》所收录的文字，在某种意义上说，都与书有关，是写书、译书、编书、读书留下的一些记录。这是一条翻译之路，寻求的是翻译之道。

其间，我想到了故去的林煌天老先生，他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翻译事业的贡献是翻译界有目共睹的，对青年翻译人才与青年翻译学者的帮助是巨大的，他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更是中国翻译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可谓译家、译者、译论，三位一体；学术性、知识性、实用性，熔于一炉；系统、开放、创新，三头并进。我也想到了沈苏儒老先生，记得他在80多岁高龄给我写信，信一直珍藏



着，他在信中表达了对中国翻译研究的深刻思考，提出中国的翻译研究不能一味照搬西方的译论，应该有自己的思考，尤其要重视对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挖掘。基于此，他身体力行，撰写了《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此书的价值是多重的，因为在我看来，当我们冷静地回顾、思

考、检点中国译学百年来的种种努力，梳理其发展的脉络，探索其成败的奥秘，总结其建设的得失时；当我们试图追寻中国译学探索的百年踪迹，对21世纪译学发展提出自己的想法、观点或构建真正意义上的译学体系时，我们不能不把目光投向近代意义上的译学开创者——严复，不能不去探究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之说什么具有永久生命力，不能不去思考他为我们的译学发展所建立的奠基性的功勋。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翻译研究，对于西方的借鉴很多，模仿也很明显，创新较少。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其实，人文学科的创新特别不容易，需要继承、积累、探索与交流，也需要质疑、需要思想的交锋。鉴于此，我一直特别关注中国翻译学界的同行在翻译探索之路上的所取得的进展，对翻译学界所出现的

不同想法、不同观点、不同意见持开放态度。对于翻译学界同仁提出的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观点，我们更应持鼓励、肯定、支持的态度，通过学术争鸣，导向新观点、新发现、新收获。对谭载喜的《翻译学》，我的立场是坚定的，在为该书所写序中，我想表明的是对翻译学建设的“认识、立场和观点”。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学科，应当享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对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探索，虽然学界一开始就有较大的反对声，但我仍然为他的著作写了序，还写了书评。生态翻译学基于(西方)生态整体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受惠于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是一项翻译学和生态学的跨学科研究，是中西结合、古今结合、文理结合的产物。当然，生态翻译学理论并非完美，但我们应当鼓励这种探索的精神。对黄忠廉的“变译说”、奚永吉的“翻译比较美学”、顾正阳就中国古诗词曲英译展开的系统研究、周丽娜的“译者行为批评”等，我一直予以关注和支持。对于学术探索，这些新观点的萌芽是特别可贵的。

读书与思考是互为促进的。这部小书所记录的文字，是我读书与思考

的价值追求；四是研究翻译与理解翻译，应该对现实重大问题有所关照，尤其要重视翻译服务国家需求所起的特殊作用；五是应站在跨文化交流的高度进行思考，以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为目标来考察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翻译界应在探讨“如何译”的基础上，突破传统的认识，在“何为译”“为何译”“译何为”三个层面进一步思考。

作为翻译学者，对书，我有特别的感情。《译道与文心》记录的就是一个翻译人的书缘，爱书人珍贵的收获。我学习季羡林的论述，对翻译的重要价值有了新的认识；读好友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对翻译的历史观有了新理解；读许渊冲有关翻译的思考，知道了何为翻译家的担当和“美”之于文学翻译家的意义。就为学为人而言，从《红与黑》第一位译者赵瑞麟的书里，看到了不灭的“诗魂年年放歌”，发现了“朴素的存在与真性的光芒”；在亦师亦友的翻译学者兼翻译家金圣华教授的书里，悟到了“少一分虚假的伟大，多一分真实的平凡”的重要性；在法国友人郁白大使的书里，感受到了“中国古代理人的悲秋情怀”。正是在读书、思考与写作的漫长历程中，我知道了“求真”的艰难与意义，也知道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心，更坚定了自己继续前行的决心；探索无止境，永远在路上。心在，文才有生命。”

(作者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